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四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一〇期 ——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7c）

【人物探索】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司马清扬
【百家争鸣】	文革工作组与王光美之谜	高子正
【文革疑点】	《“571工程”纪要》涉嫌伪造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探索】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 司马清扬 •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专案组（亦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或中央专案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参见康生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康生的发言证实专案组的手段比学生的高明多了。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中央专案组的法西斯行为还可以参阅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载《纵横》2000年第1期）。实际上，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笔者注：江青的作用和地位比较独特，因为江青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毛，所以周恩来对于江青非常迁就。以刘少奇专案为例，江青在此案上投入的精力最多、最大。但是就整个中央专案组的组织机构来说，周恩来毕竟还是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而且江青对于其他专案所投入的精力相对于刘少奇专案则少的多。）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

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组织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专案还是文革期间的刘少奇、贺龙等专案，都是依据中央专案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笔者注：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重要专案的最终仲裁完全取决于毛泽东。无论在专案迫害上还是保护解放老干部上，都是毛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的模式。）

◇ 中央专案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但是，在它存在的13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1：Schoenhals, Michael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载《China Quarterly》No. 145 (March 1996) p87-111; 2：欧阳龙门翻译稿，节选自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16章中央专案组部分）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而专案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1966年的5月20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专案委员会下的彭真专案组的组长。中央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专案会议等等。（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94页、726-734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其下属中最大的组正是负责调查他自己。先是于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来调查他的妻子，毛泽东又在1967年3月底授权专案组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刘少奇本人。）其他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康生负责杨尚昆专案，安子文负责田家英专案。陈伯达主管陆定一，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57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459页）；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1：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rly》，No. 145 May 1996, p90; 2：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2。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交班于康生，但是都认为，在整个文革期间（除周恩来病重期间和去世之后），负责中央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并且由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随着文革的深入，此专案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调查（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第一次把彭罗陆杨比喻成“四大家族”），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专案委员会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814页）揪出、批斗、逮捕、关押都是由中

央专案组作出决定。

自1967年2月起，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1：王力自述其被排除在外，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730页；2：自1967年2月19日起，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中央碰头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第130页。前后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主要原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谢富治；1967年2—3月间，毛泽东同意叶群、肖华、杨成武列席与会；随着文革深入，黄永胜、吴法宪亦与会；其间成员也不断遭到清洗；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6卷 第61页；3：无论是早期的中央碰头会还是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都是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并主持会议，并决定会议议程，见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中多次记载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情况；4：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开始是由陈伯达主持并召集，但是因为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导致陈伯达不再主持会议改由周恩来主持。见《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82页。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此情况发生在1966年9月期间）。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专案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笔者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不具备公检法的权力，但是也可以作出逮捕、关押某人的权力。这充分体现了某种体制特色。例如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时就可以当场宣布逮捕财政部的某副部长。至于此时的周恩来是以何种身份下的命令，就很值得玩味。）最重要的是，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织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但是更有权力。中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专案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专案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专案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789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126位解放军军官担任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小组正副组长一职（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在1967年的秋天，专案委员会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专案委员会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专案组：例如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此专案组主要负责对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 / 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雨花》1994年06期。从张嵩山之文可以看出杨成武在主管“二办”时是非常凶狠与严酷的。在1968年3月24日杨成武倒台后，根据黄克诚的回忆，由黄永胜接班主管“二办”之后被审查人员的日子则好过多了。见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80—282页）例如彭德怀专案、罗瑞卿专案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专案等。（1：Zhang Songshan《“On the ‘He Long Case Group’”》in Schoenhals, Mike《Mao's Great Inquisition: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Armonk. NY Sharp

e 1996 p 24—42; 2: 有关贺龙的一位老部下的被打倒以及被中央专案组调查的描述, 见“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539页; 3: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 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697—703页; 4: 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82; 5: 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纵横》2000年第1期)

以贺龙专案组为例, 称其为主案组, 下面设17个分案组, 计有: 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样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样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续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 / 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

1968年, “三办”成立, 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领导干部的专案, 三办的主任是谢富治。但是“三办”开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却是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1969年8月15日, 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讲: “‘五·一六’问题, 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 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 他们让你们查就查, 要防止扩大化。”《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 “三办”后来也处理许多其他的案子, 例如“抓叛徒专案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 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 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求实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13—115页) 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 此案导致99人遭迫害, 其中9人入狱, 23人被软禁, 3人被逼疯, 2人死于审讯者之手。(凌云《康生为何制造“苏枚谋杀案”》载祝春林《历史瞬间》1, 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6页)

文革期间, 为中央专案组服务, 成为许多党、政、军机关的重点任务。1967年10月, 中央专案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 而且在北京以外的18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信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1967. 10. 08. 中发[67]312号) 1968年8月, 谢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 为此解放军抽调了700多人, 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仲侃《康生评传》, 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423页)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虑撤销中央专案组, 就像九大以后撤销中央文革小组一样, (仲侃《康生评传》第423、415页) 但是到了1969年, 中央专案组变得太有用处而无法轻易撤销。1970年, 它又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 一年后又有了林彪专案。1975年, 中央曾经设想尽快结束专案, 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随即撤销。(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等) 但是最终撤销中央专案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它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毛以后的领导人处理“四人帮”专案。(欧阳龙门翻译稿, 节选自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16章中央专案组部分)

◇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虽然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曾经担任“二办”主任的杨成武引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周恩来为整个中央专案组的组长。见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年第1期；Schoenhals, Mike则认为周恩来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但是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周是中央专案组的最高负责人。见Schoenhals, Mike《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5 May 1996 p90）但却主持其工作会议，参与其所有的立案调查活动，给予指示，批阅下面调查小组所提出的报告，并报告毛泽东。但是对外界来说，周恩来同中央专案组的关系并不明朗。（1：Schoenhals, Mike在1995年5月份对王力的采访，Schoenhals Mike《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5 May 1996；2：周恩来对于下属专案小组的报告批示，可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周恩来对贺龙专案组请示报告的批示》）。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李锐曾经这样回忆：1967年8月间，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恩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忆说：专案组的人员告诉他，武光专案组是在周恩来和康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武光《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47页）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受到批判，无法继续工作，邓小平把工作移交给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戚本禹的话表明，专案组的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实际上，此专案委员会及以后的中央专案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1：Macfarquhar, Roderick《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2；2：毛泽东对于专案组的批示可见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央专案组关于邓小平材料的报告及毛泽东批示；3：关于林彪的作用和态度，林彪只是毛泽东划圈我划圈，参见于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4：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730页）实际上，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97—698页）

例如在1967年10月8日，一张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传单批评了毛泽东、林彪等，唯一对周恩来提出了表扬。周恩来接到此传单后立即转交给毛泽东。10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破案。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谢富治和吴法宪参加。（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02—703页）

由于中央专案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专案组工作。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98页）

为了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1967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专案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专案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肖二人负责。（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对于中央专案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发出。在中央专案组内部，对有关专案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专案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决定是否可以。当事人回忆：1968年6月8日，我呈送了上任后的第一份报告：

永胜、法宪、叶群、作鹏同志：

为全面审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历史，需向中组部借阅邓的档案。

是否可以，请批示！

黄永胜阅后划了个圈，在报告的天头批：“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陈、江、康等均划圈同意。五天后报告从周恩来办公室批转回来，右下角几行饱满的钢笔字：“同意。但目前江青处，过几天后再办。周恩来。六月二十三日。”（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 / 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由此可以断定，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关于黄永胜对彭德怀专案的报告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99—700页）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高达88位中央委员因为“叛徒”或者“特务”等罪被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1：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rly》No. 145 May 1996 p91—92；2：李可、郝生章译《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版 第248页）每个专案组下设很多分组，这些小组曾经一度调查过1262位主要案犯和数目不详的相关案犯。（程敏编《党内大奸》，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把这些罪行统统都扣在康生的头上是不公正的。1968年9月24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 / 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第14页）

在“九一三”之后，中央专案组重组，在1971年10月3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页）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杰作”和“功劳”。

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专案审查的意见，1975年2月底至3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专案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

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1：《“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编写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页；3：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84页）许多官方文章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后期解放了许多被专案组审查的老干部一事津津乐道，也有的拿出对周恩来有利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例如《周恩来年谱》记录周恩来在1967年5月19日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然而这种证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周恩来在中央专案组的地位。后期的干部解放即使是周恩来的功劳，那么周恩来也应当为专案组的倒行逆施负责！审查所谓“林彪集团”的专案审查是由周恩来总负责，同样，审查刘少奇等革命元勋的工作也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rly》No. 145 May 1996 p109）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二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页；2：有资料谈到：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省长以上高级干部立案审查的高达75%。郭德宏、汤应武主编《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78页。涉及面如此之广的最重要原因是周恩来授权群众组织可以自己成立专案组。详见下述）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私欲吗？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战斗的团体，都在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毛本人或者为毛的路线）工作，要对中央专案组所犯下的包括审讯、调查、逮捕和实施众多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的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专案组会议上预先讨论通过，也包含了周恩来对于众多专案组所提交报告的评语以及专案组所讨论通过的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无一不是令人发指、怵目惊心。如果将周恩来在毛泽东指示下所保护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领导下的整个中央专案组所迫害的老干部对比，周恩来的保护无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实际上，任何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群众组织提出批斗，都必须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对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护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后，不少群众组织提出“炮轰谭震林。”首先是3月14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5月份，农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斗谭震林。6月13日，周恩来批示可以批斗谭震林。（周恩来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时的指示 1967.06.13 周总理明确指示：把谭震林揪到北京农业大学去批斗，并指定他的联络员具体负责，争取在最短时间召开批斗大会。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蒯大富被采访时就陈述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丁东《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华夏文

摘增刊第519期，2006年8月8日出版)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诬陷薄一波是叛徒。不过，在薄一波因长期“监护”身体衰弱、危及生命时，周恩来指示将他送进医院保护起来，救了他一命。以至后来薄一波说，如果没有周的关怀，他也许早已被迫害死了。(《新华月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号第65页)知情人讲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将帅能否入医院治疗，甚至是否可以开刀，都要经周亲自批示。知情人亦讲述了陈毅在治疗上的失误应由周恩来负责。可以说，相对于薄一波的幸运，周恩来制造了更多的不幸。

◇ 红卫兵、造反派是周恩来抓叛徒的“铁拳头”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聂元梓《聂元梓口述自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版第232—233页)除此之外，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周恩来对瞿秋白的批判。1966年8月30。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而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1967)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1967。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全国到处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很难说与周恩来的这种鼓动和支持没有关系。由群众组织任意推倒中共组织对在白区工作过、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而对于这种“揪叛徒”之风，现在都归到康生一个人头上。(胡学常《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百年潮》2008年第2期)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第232页)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代表的讲话。1967.03.21。载《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在第一次揪彭未果之后，周恩来则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1：戴维堤《逝者如斯》未印刷稿；笔者在同戴维堤先生见面时曾经当面询问过此事；2：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见华夏文摘增刊第363期，2003年12月9日出版；朱成昭在其与宋永毅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是周恩来下令要朱派人去把彭德怀揪回来，这和其原来发在浴火凤凰网站的自述是相符合的；3：笔者注：关于揪彭德怀一事的说法另见阎长贵《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记忆》2009年第11期；4：笔者曾经就此事同阎长贵老师多次探讨，特表示感谢)

在外交部，周恩来指示：要结合批判刘少奇，把外交部干部的历史问题查清。根据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成立了一个红色尖兵四连（简称“红四连”），专门负责抓叛徒。干部司的审干处配合了此项工作，把其掌握的干部材料提供给“红四连”开展抓叛徒的运动。1967年9月，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汉夫就被当作叛徒被拘捕审查。（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 专案组的证据与周恩来的指导

专案组的调查取证和定性是根据当时的需求，特别是可以随意更改。例如蒋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对刘少奇的工作，而周恩来在1970年11月1号谈蒋南翔问题的时候又明确表示蒋南翔在文革前是极力吹捧刘少奇。（周恩来谈清华大学蒋南翔问题谈话摘录，《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周恩来在“七二〇”事件之后为了表示对王力的特殊照顾和欢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专机盘旋以待周恩来专机先行降落，然后在机场组织欢迎王力的仪式，一如迎接英雄凯旋，但是后来周恩来却表示王力是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的罪名。（1：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3—1010页；2：周恩来1970年1月24讲话记录稿，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专案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黄铮《刘少奇专案组始末》，选自《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叙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3—264页）周恩来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领导人。（吴林泉 彭飞《草岚春秋》，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版第249—256页）面对如此众多有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例如在《刘少奇专案组》中，面对如此破绽百出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如此为周恩来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3—1954页）周恩来的判断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陈伯达专案组给出的有关陈伯达罪行材料的证明，当时仅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何况周恩来了！（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4—41页）作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专案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专案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

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高默波采访王年一，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版）

周恩来还把成立专案权下放给造反派。1967年1月份夺权兴起之后，周恩来曾经这样说：“黑材料要集中起来，搞个目录，以后集中烧毁。处理材料问题还没有一个好的典型，为黑材料争论不休，费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可以找几个人成立专案处理，处理材料是极其复杂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来，中央决定嘛！现在夺权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这里边去，否则就成了文牍主义了，只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才拿出来。不钻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转移了。毛主席过去受打击，现在事情都清楚，至于过去，谁说了什么话，谁搞了什么材料，主席才不管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纸只字中，妨碍了大方向。虽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几个人搞专案，不要都陷在这里，档案不可没有，不可太多。”（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1967.01.27。《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此举为各造反派成立专案审查、迫害对立面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在谈及卫生部孙正专案的时候，指出：（1）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罪状的落实主要是看情节，例如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2）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1970.12.28。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周恩来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单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够满足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同时周恩来也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得不另行谋策并最终提供了证据。依靠这些证据，1968年10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68）152号、中发（68）155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周恩来在1969年“九大”期间以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象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的发言。1969.04.14。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官方强调的周恩来内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强调的他是为了服从大局。这些说法都无法为周恩来洗脱罪名。周恩来的内心无人知道，但是客观的所作所为都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记录下来。

~~~~~

## 【百家争鸣】

### 文革工作组与王光美之谜

• 高子正 •

#### ◇ 两点说明

2009年的返校,我有幸得到了邱心伟的新著《大事日记》;购买了刘冰所著《风雨岁月》;后来,承蒙原本班(制九一)同学吴雪芳转送沈如槐签名送她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以及《孙维藩日记》。加上我原有的部分图书。我觉得有了一定的学习和研究基础条件。

社会上对于文革,普遍认为是敏感问题,甚至是“禁区”。我想,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内幕资料尚未公开;对于文革的主流解释,能够避免人们纠缠历史而忽视现在重要的改革开放任务,但是,往往不能解释具体的历史问题。加上涉及到部分人员或者后代的种种原因,探索真相是非常艰难和复杂的事情。

但是,如果对我们亲身经历的清华大学文革,也采取回避的态度,如何保证真相留给人们,如何保证后人真正能够吸取教训?

笔者因此尝试进行部分探索工作,主要是提出一些疑问和初步分析,表明初步的思考或者反思。属于“抛砖引玉”性质。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 ◇ 文革工作组与王光美之谜

陆小宝说过:“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入高校,种种作为,后来遭到毛泽东的批判,他自己辩解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种说辞已被现今话语界和学术界普遍认可。但是,事实真相当真如此简单吗?”

我自己也是很长时间认同那种观点的。

这次,比较仔细地阅读邱心伟的《大事日志》以及其它书籍,感到事情很可能不那么简单。

初步想分析一下几个问题:

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而派出工作组到清华大学的?

王光美参加工作组,是为了什么?

工作组的方向与目的何在?

如今应该如何评价工作组?

#### 一、为何向清华大学派工作组?

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当时的时间表: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康生在事先几个小时通知了周恩来;

1966年6月3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李雪峰任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各校同学开始响应,并质问学校领导。

此间,各校党政主要领导正在参加北京新市委召开的扩大会议。比如,清华大学就是刘冰

和胡建参加。只能晚上不开会的时候，找一找留校的艾知生，研究一下学校的文革情况；找一找蒋南翔汇报与请示。

1966年6月8日，下午4点，新市委通知校党委，将派工作组来校。晚上，刘、胡和艾见到了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

1966年6月13日，北京新市委郭影秋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

1966年7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批评了派工作组的错误。

1966年7月28日，北京新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召开全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周总理、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作了讲话，做了检查，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不得力。其中，刘少奇特别讲到：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讲话后，毛主席出来接见了全体代表。

1966年8月13日，工作组从清华大学全部撤离。

从上述这个时间表你能看出什么问题吗？事情不是很普通很正常的吗？

然而，仔细分析一下，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

在《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转载者注：该书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应该有比较权威的参考价值）中，王光美写到：（页374—375）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口气很大，说：‘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问题。会议在我们家福禄居会议室举行。由于彭真、陆定一同志被撤职，中央决定调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这天陶铸同志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一下火车就被接到我们家，出席会议。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不是在福禄居就是在怀仁堂后厅，由少奇同志主持。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

“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那几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围在北京市委大楼前，甚至到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少奇、恩来、小平同志是6月9日乘一架飞机去杭州，1

2日回来的。”

我们来试着分析一下：

刘少奇说，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事先不知道，那肯定是事实；但是，能由此导致说他是“对文革”“很不理解”的结论吗？

在此之前，经历了对“三家村”和吴晗的批判，经历了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批判，刘少奇还主持通过了“516通知”，该通知明确的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有人提出删除此话，但是康生明确回答，不行，那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人们应该过低的估计刘少奇的政治敏感性和能力吗？

在《王光美访谈录》页389中，王光美写道：

“……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诵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主任。’少奇的话噎的造反派哑口无言。”

虽然，我们不能说刘少奇就一定完全看透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冲着他来的；人们可以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但是，我们绝不可以真的以为刘某人一直是糊里糊涂的，一丝一毫也没有任何怀疑。

王光美说：“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那么，向清华大学派出工作组，是报毛主席同意的吗？

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显然不是，是刘少奇自己的决定。

那么，派工作组的事情，真的是“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

看一下邱心伟的《大事日志》和刘冰的《风雨岁月》，我们得知，工作组是8号下午抵达清华大学的，而且，是副组长周赤萍先行到达；组长叶林是9号才到的。

届时，周赤萍（解放军中将），是冶金部副部长；叶林是国家经委主任。工作地点都应该在北京。对于讲究礼仪和规格的国人来说，组长差一天才赶到。不能不说存在某种问题。

而且，既然9号少奇、总理和小平同志都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请毛主席回北京指挥运动，12号返回，何必非得在8号就匆匆派出工作组呢？

从邱心伟他们的《大事日记》中，我们也丝毫找不到学校党委控制不了局势，以及几万学生去北京市委请求派工作组的任何消息和记录。是邱心伟他们遗漏了，还是王光美夸大了当时的情形？

## 二、王光美为何来到清华大学工作组？

从王光美访谈录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原因与理由，导致刘少奇指派王光美来到清华大学的

工作组。

王光美很简单地描述说：

“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当时对怎么去还费了一番周折：坐轿车去太显眼，骑自行车吧，路太远也不安全。贺龙同志和我们家的孩子贺鹏飞、刘涛那时在清华大学读书。贺老总听说后给我搞了辆卡车，让我把自行车放在卡车上，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再下来骑自行车进学校。为什么要把自行车带去呢？我是想当天就不回家了，住在学校或学校附近，等了解情况多一点以后再回来。去之前我没有通知清华大学。”

既然，采用什么方法去清华大学都要思考一番；那么，为什么要去清华大学，难道就不思考了吗？

目前发发表的文章和资料都没有分析这个问题。笔者个人的看法是，既然刘少奇认为毛主席支持的陈伯达、康生等人对于北大的活动，造成了学校和学生的混乱，他决定派出工作组，显然是要制止这种混乱现象。那么，去哪里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和作用呢？

众所周知，北京的高等院校众多，但是，影响最大的，只有北大和清华两所。

而北大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康生通知是毛主席让广播的，说明那是主席的“点”，他不可能在北大与主席“硬碰硬”。于是，清华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了。

王光美说：“到了清华大学，刘涛等把我送到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已经知道我要来，是薄一波同志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告诉他的。叶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王光美访谈录，页376）

查询邱心伟的《大事日记》，页19写到，

6月19日

“薄一波副总理，王光美来我校看大字报。薄副总理与蒯大富辩论了30分钟。”

这里，与王光美的自述有一点矛盾。我觉得，《大事日志》描述的不很清楚。还是应该相信王光美的自述，说明她不是和薄一波一起来到清华的。那么，显然，薄一波那儿有个说法，表明王光美随后会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而且，薄一波特地告诉了叶林。

王光美回忆说，6月19日，刘少奇听到女儿平平说有人反对工作组，则表示：

“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当时我女儿平平在北师大一附中上学。她回家说，她们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

少奇同志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

既然，王光美19日晚到清华大学看了大字报，就应该看到有人反对工作组的事情。上述问题，无需女儿平平汇报。只是，我们不知道，刘少奇指的后面有高级干部是说的谁？好像后来工作组也没有具体追查？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我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王光美访谈录。页375）

而邱心伟《大事日记》的描述更为准确：

“6月21日 王光美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自称），但实为配备有两名秘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幕后操纵者，在工化系蹲点。”

### 三、工作组的方向与目的何在？

从《大事日志》等等资料可以看出，工作组在清华大学的50多天的时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抛出蒋南翔，作为“黑帮”，作为文革的主要革命对象，提供给青年学生批判；第二件，甩开清华校党委，把清华大学当时的各级干部，当成走资派。第三件，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

至于上述刘少奇说的“后面有高级干部”，意味着要揪后台的问题，我倒是没有印象。

一方面，王光美对学生讲：“我们不知内情光喊口号并不能斗倒蒋南翔，报上没点蒋南翔的名，陆平是撤职，蒋南翔是停职，要从揭的材料看是不是黑帮。在没有确定之前，先不要斗，否则以后就被动了。”（《大事日志》 页20）。

《大事日志》页16写到：

“6月15日陶铸同志在高教部讲话：‘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了我们的高教部，也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从揭出来的大量的事实来看，以蒋南翔为首的一伙人把高教部搞成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高教部，不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来推进全国的高等教育，而是相反，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坚决拿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高等学校的青年，把高等学校引向资产阶级邪路上去。’”

据《王光美访谈录》介绍，陶铸是6月3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决定接替陆定一来主管教育和宣传部门的。当天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在刘少奇家里召开的会议。他到任不过10天左右；如果没有别人说话，他能这样对一个中央委员，一个高教部长说这种结论性的意见吗？

另一方面，刘少奇在27日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得了。”（《大事日志》页23）

对照几天内，三个人不同语调的发言，我们可以想到，对于蒋南翔，当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希望找到证据，把他打成黑帮。

据邱心伟的《大事日志》统计，“据说12至16日，103名清华干部被戴上高帽游行。工作组把112人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页17）

《大事日志》记载：

“工作组在新水 3 0 0 召开了批判蒯大富的第二次辩论会。提出‘反蒋必先反蒯’。发言中定蒯为反革命分子，提出引导三部曲：（1）引导同学承认自己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2）承认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3）承认自己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与效果是完全统一的。”（页 2 3）

我没有找到《大事日志》对于工作组反蒯，把学生打成反动学生的统计数字。据不少人回忆，大约是 7 0 0 人；沈如槐的书里也这么写，想必有资料依据。

据其他人的文章：

“1 9 6 6 年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是刘邓主持并指派工作组操纵群众运动，目的是要把文革变成第二次反右。根据王任重的笔记，文革按照刘少奇的布置是要打出 3 0 — 4 0 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要在武汉高校学生中间抓 5 % 的右派。”（引自“老田”的博客，《谈毛主席的第二件大事》一文）

看来，清华大学工作组是坚决执行了刘少奇上述政策的。

阅读《大事日志》，唤醒了我几乎忘却的记忆。我想到了三件小事，虽然，他们如此微小，不值得在《大事日志》这样的资料图书里提及；但是，作为亲历者的回忆，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

第一件小事：文革初期，我们制九一班的 5 位同学，以王宝桐为首，给刘承娴（大事日志说她是校统战部副部长，我的记忆里，她好像是校办公室的什么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她们对问题解释不清。（具体的，我忘记了）。工作组进校后，先是安排选举。王宝桐被选为系文革小组年级组长，我被选为班级文革组长。

工作组安排学校有关人员到学生群众中去检讨。刘承娴来到了我们制九一班。我们没有改变教室的布局，她就坐在前面的讲桌后椅子上，面对着如同上课一般的学生，讲述她的认识。最后，我代表全班同学，欢迎她站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一边，站到群众一边来！

刘承娴曾经很感动地说，她以为要受到批斗，戴高帽子等等，但是，一切都没有发生；她感到：革命学生还是很注意听毛主席的话，很注意政策的。

我没把这当成事。但是，后来，听说，刘承娴是“罗文李绕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深感遗憾；更后来，听说她被迫害致死，更是惋惜。（参看《大事日志》页 3 5 5）

现在，看到刘冰的回忆录，他从北京市委扩大会议后返校，即被多次批斗，戴高帽……而工作组事先不管；事后，马上出来，要求这些“黑帮分子”正确对待群众运动？！那就是工作组对待清华大学广大干部的做法吗？

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干部是被批斗的，多少是真正去“检查错误”的……

第二件小事：

6 月 2 1 日，蒯大富写了“夺权”的那段“小批”以后，工作组布置我们反驳。记得还是我们五个人，写了批驳蒯大富的大字报。随后，2 4 日的辩论会让我去参加。（那次会好像是布



置什么人参加，有准备的)。我因为觉得自己水平很低，应该多听多想多学，不要过急的发言，所以，对双方都没有鼓掌。而另一班的文革小组长X X X，后来告诉我，他听了蒯大富慷慨激昂的发言，十分感动，热烈鼓掌。会后，还把自己的看法汇报给工作组。没想到，第二天，工作组让他主持开会学习，接着马上宣布：“鉴于X X X严重丧失立场，立刻撤掉其文革小组长职务，接受批判帮助！”形势一下子就变了……

第三件小事：

我们班的蓝镜如同学，平时比较活跃，喜欢和别的班别的系的同学交往。不知怎么的，蓝镜如被注意到了和其他人说到同情蒯大富的问题，于是，工作组安排他反复做检查和交代。作为当时班上的文革小组长，我执行了工作组的意见。现在，我早已忘记当年蓝镜如同学他说了什么，又检查了什么。但是，当时他那种痛苦而又无奈的表情，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为自己整过蓝镜如同学深感内疚。特此在此向蓝镜如同学表示深深的道歉！！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蓝镜如和其他同学理解：当时的工作组成员，不止一次的质问我，反右斗争时，清华的右派分子占到5%；现在，反对工作组的反党分子，蒯派难道就不是占到5%吗？我当时很害怕：觉得，他们工作组总想揪出5%的反动学生。我们全班37人，如果按照5%的比例计算，怎么也得有1—2人。我只能拼命批判蓝镜如的“错误”，才能不使他被划到反动学生那一边去。幸亏，工作组不久就撤走了；否则，事情如何发展，还真的很难说。

这三件事情，我也许记得有错，或者认识有错。请本班同学或者其他知情人提出批评更正！

今天，如何认识工作组？

虽然，事情过去了40多年；除了我们“遗老”以外，许多青年人对此毫无兴趣。我至今仍感到准确的描述和给工作组“定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在刘冰的《风雨岁月》中，作者写道：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政治斗争。”

这是目前领导承认，主流学术界承认的一种标准说法。如何用它来解释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现象呢？

我习惯于根据“人”的情况来给事情定性。但是，具体到清华大学工作组问题，则很难。

一方面，当年工作组的副组长周赤萍，解放军中将，后来被认为写过文章吹捧林彪，是其反党集团成员；但后来又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一方面，当年毛主席支持，特派周总理给予平反的革命小将蒯大富，后来犯了错误，被认为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件成员，受到审判。

一方面，文革中被批斗的刘少奇，后来得到平反昭雪；王光美被牵连入狱12年，也得到平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

政协常委。

王光美，中国 20 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北京中学生中有名的“数学三王”之一、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王光美生前最后的职务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的扶贫计划“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晚年的王光美将精力贡献给“幸福工程”，为了帮“幸福工程”筹款，王光美曾将母亲传给她的古董公开拍卖。

在《杨澜访谈录》中，杨澜说道：

杨澜：在采访中的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谈到在文革初期，当她还住在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教她只有 6 岁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当我问她，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她却说，我不想去追究，因为如果我追究的话，这个人就要倒霉了。能够宽恕他人，也终于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

《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她简单地提到工作组，她写到，

“6 月 21 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我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页 376）

王光美没有提到对蒯大富的批判等等细节，后一章节就直接叙述撤工作组的情况了。

该书是 2006 年出版发行的。是否代表了王光美晚年的观点？是否意味着她认为，工作组的方向是正确的，反对蒯大富等少数“反动学生”还是对的？

蒋南翔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高教部长，被稀里糊涂的停职反省，后来实际上被当成黑帮批斗。……

联想到后来，刘少奇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在没有经过任何党纪国法的条件下，被批斗，被停止一切个人权利和自由，乃至被当成叛徒内奸开除……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应该怎样纠正？那是一个不光我们清华学子，而且需要我们民族和人民深思的问题。

不管最终的高层次分析结论如何，我赞同沈如槐学友对工作组问题的分析。

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书，页 17—18，他写道：

“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我仍然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是有问题的。第一，工作组夺了校党委的权，一下子罢免全校 500 多名干部的官，这是不相信清华党的组织；第二，工作组几天之内又将反对工作组的 700 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这是不相信清华广大群众。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工作组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向高校派工作组本意是加强党的领导，但这恰恰是以否定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工作组代理行使校党委职权，使清华原有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体系一下子陷于瘫痪，却从根本上否定了解放后十七年党在清华的领导。这样就助长了学生的造反精神，出现了部分学生乱揪、乱斗干部的局面。而工作组用生硬的办法限制学生的造反行为，又造成了学生的不满与反抗。工作组不能客观估计学生的不满情绪并加以正确引导，反而认为这是右派学生向党夺权，从而对这些学生进行围攻和斗争。

从根本上说，工作组的做法也是一种极‘左’，首先，他们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夸大阶级敌人的力量，一有风吹草动，就说阶级敌人向党进攻；其次，遇到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就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

如果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把王光美的清华经验，推广到全国，无论是对于干部，还是对于群众，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那肯定也是一场灾难，一场悲剧，其后果可能会比当年的反右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页17，页18）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当年的工作组和王光美呢？还是让大家来评论吧。

~~~~~

【文革疑点】

《“571工程”纪要》涉嫌伪造

• 舒 云 •

1980年“两案”（林彪、四人帮）审判后，有一位大人物创造出新的“两个凡是”，中心意思是“两案”不准翻。30年过去，成千上万被卷进“九一三事件”冤案的人员再三上诉，但是贴上封条的“两案”再也没有打开过。

难道人为捆绑的“两案”真是“铁案”一块吗？

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明确表示对十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提起公诉。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两案”判决后，涉及林彪案的六名死者中，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提到了，于新野、刘沛丰根本没有提到，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家属都受到了极严厉的处理。

涉及到死者的案情并没有一风吹。

按照中国刑法，刑事案件中的死者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案情一定要查清。不管过去多少年，尤其是关键性案情，查情才能结案，否则不能结案。

起诉林彪一案，最关键的证据是《“571工程”纪要》。

但是，《“571工程”纪要》却没有经过特别法庭认证。

为什么不调查清楚林彪案中的关键性案情？

◇ 1971年9月13日，李伟信一被捕就供出《“571工程”纪要》

1971年9月13日凌晨5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接到报告，北京怀柔县境内发现迫降的直升机，机上5人，3人死亡，李伟信被抓获，另一名副驾驶陈士印正在搜寻。傍晚，两名俘虏和缴获的文件被押运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缴获的文件中有党和军队的大量绝密文件、国防力量部署图表、北京经乌兰巴托至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和机场资料以及大量美元。

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吴忠审讯李伟信。

李伟信很快交代乘机外逃的经过，并供出武装政变计划，阴谋谋害毛泽东、在广州另立中央。

当晚，专业人员拼接现场找到的纸片。主要有：林彪署名的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所谓“小舰队”的成员名单，飞机编号和人员安排，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记录的毛泽东南巡谈话要点。

可是，所有的缴获文件中没有李伟信交代的武装政变计划。

吴忠忽然想起李伟信提到一组数字“571”，于是连夜再次提审李伟信。

李伟信说：“571”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代号，全称是“571工程纪要”，是林立果亲自确定的名称，“571”是“武装起义”的意思。

李伟信没有交代《“571工程”纪要》在哪里。

吴忠将缴获物品连同李伟信的供词，上报周恩来办公室。

这个时候，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早人去楼空，只有《“571工程”纪要》还在桌子上。

◇ 《571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26天后上交的

1971年9月12日，空军学院管理处副处长王兰义为林立果一伙安排中午饭后，再没有人找他。9月14日19时30分，王兰义再往将军楼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楼门虚掩，车库也没锁，他把门锁上。22时王兰义看到将军楼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19时30分，王兰义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他决定进去看看。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餐桌上杂乱放着本子、书报和汽水瓶，边上放着一个敞开口的大书包，好像要把桌上的东西装进去带走。……餐桌上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红色拉链本。

只有红色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

9月16日20时，王兰义左思右想，还是摸黑把包括红色拉链本在内的几个本子拿了出来，交给处长张帆。

10月6日晚，李德生来空军学院传达中央57号文件。

10月7日2时，张帆把红色拉链本交给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

10月8日19时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密封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的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揭发材料。

被毛泽东指定负责“九一三事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德生回忆：这个密封件第一页标题是《“571工程”纪要》，下面用括号写着（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再下面是行书，每行或两行一个意思，共22页。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这是什么意思？

李德生立即派人提审李伟信。李伟信看了原件后交代：2月，林彪、叶群带林立果到苏州后，派林立果到杭州活动空五军政委陈励耘。3月18日，林立果到上海，对于新野、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商量，“争取和平过渡，但是做好武装起义准备”。林立果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定名为“571工程”计划。这个本子是于新野根据讨论情况，写出《“571工程”纪要》。以后经李伟信、空军党办一处秘书程洪珍、空军司办副主任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定是于新野的原稿。

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李德生将《“571工程”纪要》和李伟信的交代，以“特急绝密件”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当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认为这是搜查到的林彪材料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571工程”纪要》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当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

◇ 只有李伟信口供提到《“571工程”纪要》

1972年1月13日，毛泽东批示“下发”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这份中共中央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讲林彪一伙制定的《“571工程”纪要》，中央专案组调查了其出笼经过和林彪一伙根据这个纲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情况。随中共中央文件同时下发的还有附录二《“571工程”纪要》全文和附录三李伟信的笔供。

1970年秋天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党开展批陈整风，毛泽东批评了黄吴李邱，12月召开华北会议，1971年1月改组北京军区。这之后有关《“571工程”纪要》的所有材料全部出自李伟信的交代。

李伟信交代：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研究形势后，认为“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对于林彪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抢班。如果提前抢班，就要“直接陷害毛主席”，他们想的办法是：“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争取和平过渡，但是做好武装起义准备”。准备工作分两个方面，一是要有个计划，计划的代号想了好久，最后由林立果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定名为“571工程”计划。并且决定，这个计划，

按照林立果到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来写。二是要有个组织，即以培养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于新野按照林彪、林立果的意图，和他们商量的内容，于22日至24日写出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7、8月，于新野在广州曾经对李伟信说，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叶、李、邱都检讨了，叶群很紧张。……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以上是林立果3月份在上海的反革命活动，现在另外交代和揭发几个问题。一、“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一本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在李德生的秘书祝庭勋写的回忆录中，说李德生听了李伟信的交代，终于弄清了这个谜。在这些日子里，他一直在想，林彪要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搞反革命政变，尽管有鲁珉的交代，查到林彪的“手令”，可作证明。但是，这么大的行动，难道没有一个通盘安排和计划？查到《“571工程”纪要》，终于证实了林彪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

但《“571工程”纪要》到底有没有，1980年的特别法庭没有认证。

1972年中共中央文件根据李伟信的交代，确认1971年3月21日在上海召开的这个会只有四个人参加，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四个与会者只有李伟信活着，也就是说，只有李伟信一个人说有这个会，并供出了《“571工程”纪要》。

但是，空军学院“将军楼”发现的于新野记录明明是“纪要”，而唯一的证人李伟信却把“纪要”和“计划”来了个偷梁换柱。“纪要”和“计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纪要”在词典上，是记录要点的文字，而“计划”，是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571工程”纪要》只是1971年3月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的记录，根本不是什么计划。

为什么李伟信在把“纪要”说成“计划”？显然不是口误。

近年，李伟信多次散布他没有看过《“571工程”纪要》。

是这样吗？

请注意关于《“571工程”纪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附录三李伟信的笔供，李伟信说“没见过”的是“571”计划写成后，他没见过，并没有说《“571工程”纪要》草稿他没看过。李伟信的意思是《“571工程”纪要》还有一个定稿，在北戴河林彪那里。可是九一三之夜林彪等人只上了飞机，根本没有带走文件！1980年审判“两案”干脆没提“571定稿”这回事，因为谎话说得太不着边际了。

但是，如何解释李伟信参加讨论《“571工程”纪要》？又如何解释空军学院“将军楼”发现的《“571工程”纪要》？李伟信供出了《“571工程”纪要》，似乎又想不与《“571工程”纪要》藕断丝连。

不管李伟信怎样“此地无银”，《“571工程”纪要》与他紧紧拴在了一起。

◇ 李伟信为什么信口雌黄

细读李伟信 1971 年的笔供和 1980 年的口供，谎话连连。

比如：李伟信说，《“571 工程”纪要》的正文在北戴河林彪那里，林立果说林彪让搞《“571 工程”纪要》。

可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林彪知道《“571 工程”纪要》？

再比如：李伟信说，黄吴李邱知道《“571 工程”纪要》。

李伟信说，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571 工程”纪要》。

李伟信说，1971 年 2 月，林立果到杭州和陈励耘商量后，才出台的《“571 工程”纪要》。……

这些谎言，大都被 1980 年的特别法庭拆穿。特别法庭认定黄吴李邱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根本不知道《“571 工程”纪要》。

李伟信为什么要往那么多人的头上栽赃？

还有，李伟信为什么要把本来是“纪要”的东西说成“计划”？

明明《“571 工程”纪要》没有正本，只有草稿，李伟信为什么要编出《“571 工程”纪要》的“正文”？

李伟信是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空军学院将军楼最后走的人，把《“571 工程”纪要》的草稿本故意放在桌子上，他有最大的嫌疑。但是他不认账。如果做了指纹侦察，上面有李伟信的指纹，他就赖不了账。

十年中的两次审案，没有人查证《“571 工程”纪要》为什么会出现在空军学院的将军楼里，更没有对《“571 工程”纪要》的“出土”地点进行技术侦察，无头案就这样顺理成章了。

1980 年的特别法庭为什么不辨认《“571 工程”纪要》的真伪？为什么不追查《“571 工程”纪要》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不作技术侦察？而一厢情愿地把《“571 工程”纪要》作为林彪事件最铜墙铁壁的证据。

现在看，《“571 工程”纪要》有着天大的嫌疑。

本期编辑：
胡海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